



鲁迅

的

吴中杰 著

WU ZHONGJIE

抬棺人

——鲁迅后传

K825.6
L871-
谨以此书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

鲁迅

的

抬棺人

——鲁迅后传

吴中杰 著
WU ZHONGJIE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的抬棺人:鲁迅后传/吴中杰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1.6
(吴中杰鲁迅研究系列)
ISBN 978-7-309-08067-4

I. 鲁… II. 吴… III. 文学家-生平事迹-中国-现代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0311 号

鲁迅的抬棺人:鲁迅后传

吴中杰 著

责任编辑/邵 丹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

开本 787×960 1/16 印张 37.75 字数 418 千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100

ISBN 978-7-309-08067-4/K·325

定价: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 言

“文化大革命”刚结束不久，一位 30 年代过来的作家对一群青年人说：你们只要看看鲁迅晚年都接近一些什么样的人，就可以知道他本人的思想了——他尽信任一些反革命分子、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。

其时，举国上下正处于“拨乱反正”的热潮之中。“拨乱”者，即拨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之乱；“反正”者，大概是要返回到“文革”之前十七年的所谓“正确路线”上去。那时，思想解放运动还未开展，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未进行，全国尚处于“两个凡是”论思想的统治之下——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”，有些人虽然由于自身利益的关系，对毛泽东在“文革”中的所作所为是要否定的，但“文革”之前十七年所定的案子却还要维护不变。当时出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还保留着《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〉的序言和按语》，同时也收集进有关“反右运动”的几篇文章，其中包括指责冯雪峰是“共产党员反共”，说“他在那里放火，目的是要烧共产党”^①的文字；有些以某单位大批判组名义所写的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章中，还不时要拉出胡风来陪绑。这位作家虽然自己在“文

① 《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 5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，第 487、481 页。

革”中也经受过打击，刚刚复出不久，但对别人的冤假错案却毫无反思的能力，他大概认为萧军、胡风、冯雪峰等人的案子都是铁案，永远翻不了的，所以说得这样振振有词。而且，他竟忘记了，也是在鲁迅晚年，他自己就曾经写信给鲁迅，虔诚地求教在创作上所碰到的问题，并得到鲁迅热情的指示，不知这算不算受到鲁迅的培养？——但为时不久，萧军错案平反了，胡风冤案平反了，“右派分子”普遍得到了“改正”，这位“国防文学”派作家虽然由于宗派利益的关系，未必能够改变他对鲁迅的愤恨情绪，但他的言论却不攻自破了。

到得改革开放之后，又有人用鲁迅晚年的学生和友人这个题目来做文章了，也是要从交往中来看鲁迅的为人的。这时，当然不好再将胡风和冯雪峰等人拉出来当作恶人来鞭打了，倒是很为他们鸣不平，所谴责的是夏衍和乔冠华对他们的态度。说冯雪峰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命运那么悲惨，夏衍还要在回忆文章中对他加以贬损；胡风在困境中向老友乔冠华求助，而乔冠华的态度竟如此冷酷。他是从夏、乔这两个人的行为，来透视鲁迅的思想，大概也是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的意思罢。然而略知鲁迅生平和交往的人都知道，夏衍是鲁迅晚年所不喜欢的人，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中所谴责的“四条汉子”，就有他一个，而乔冠华则与鲁迅毫无交往；倒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冯雪峰和胡风，正是鲁迅晚年所倚重之人。要鲁迅为夏衍和乔冠华的行为负责，实在比“瓜蔓抄”还厉害，因为他们之间连瓜蔓也没有，这只能说是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了。

这两位论者，观点虽然截然相反，而思维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。他们的做法，不禁使人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：《可恶罪》。这篇杂文，是鲁迅在广州看到政局丕变而置人于罪的方法则相同的

现象之后所写。文章说：“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，都是花言巧语，只消以一语包括之，曰：可恶罪。譬如，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，要给他吃点苦罢，就有这样的法子。倘在广州而又是‘清党’之前，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。那么，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‘反革命’，有罪。若在‘清党’之后呢，要说他是 CP 或 CY，没有证据，则可以指为‘亲共派’。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是‘反革命’，有罪。……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，所以枪毙或坐监的。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，是先因为被人认为‘可恶’，这才终于犯了罪。许多罪人，应该称为‘可恶的人’。”现在，鲁迅也成为这样“可恶的人”，所以被找出各种理由来定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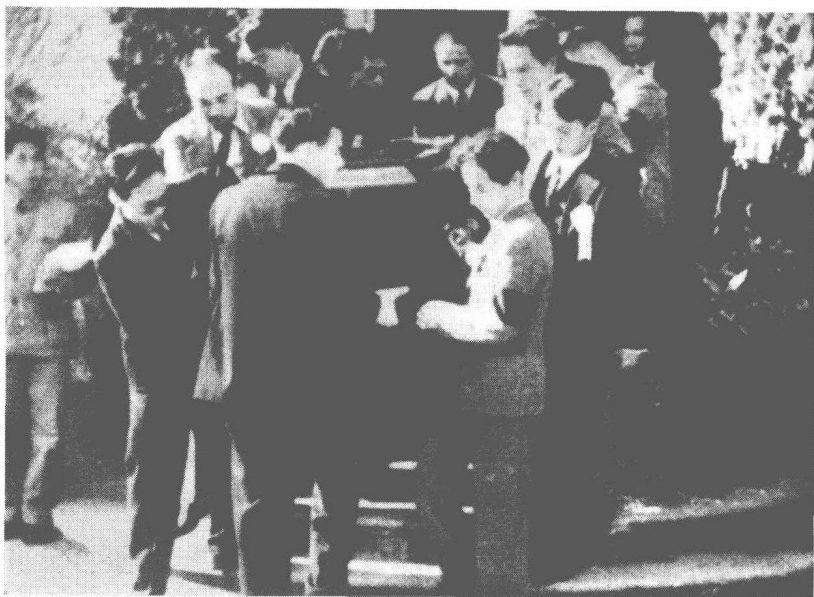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这两位论者的论点，虽然都以论据的不实，而落了空，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，还是能引人思考的。我们的确可以从鲁迅晚年所接近和信任的青年作家的为人中，看出他的思想倾向，只是这些人并非反革命分子，而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革命者，他们并非害人的蛀虫，而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。而且，从这些人的遭遇中，也可以看到鲁迅开创的文学事业所经受的挫折。

但鲁迅晚年的青年朋友多矣，我们应选哪些人作为代表呢？

本书选择了鲁迅的抬棺人。

中国旧式葬仪上的抬棺人都是些粗工，与死者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按西洋的风尚，抬棺人往往是接班人、继承人的象征。列宁逝世时，斯大林故意不通知正在南方巡视的托洛茨基回莫斯科参加丧礼，就是要把托洛茨基排斥在抬棺人的行列之外，他自己抬着列宁的棺材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面前，显示出一副接班人的派头。这风尚，后来也影响到中国。

鲁迅的抬棺人是哪些人？据田军（萧军）所写的《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》中所载：1936 年 10 月 22 日，下午“一时五十分举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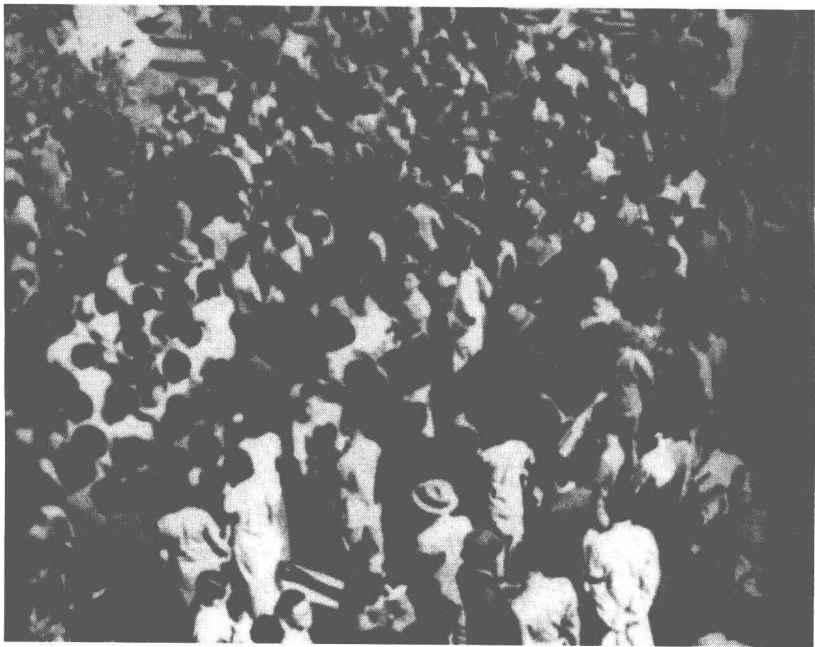
青年作家为鲁迅抬棺的场景

‘启灵祭’。敬礼后，由参加的三十余人绕棺一周，而后由鹿地亘、胡风、巴金、黄源、黎烈文、孟十还、靳以、张天翼、吴朗西、陈白尘、萧乾、聂绀弩、欧阳山、周文、曹白、田军等扶柩上车”。这里列名的有十六人。不过也有不同的记载，比如，当时《申报》有过报导：“十二人扶柩出礼堂”；《华美晚报》报导：“大批青年学生送鲁迅入葬，十四位作家亲扶棺柩”。近年孔海珠女士在《痛别鲁迅》一书中则另有说法。她认为：“还应注意十六位人数是否太多了？因为抬棺时人数太多、太挤会影响葬仪的进行。”她从当时在万国殡仪馆启灵时抬棺下台阶的照片中，考证出了一个十二人的名单，每边六人，分别是：萧军、吴朗西、靳以、黄源、胡风、巴金；黎烈文、周文、姚克、张天翼、曹白、鹿地亘。原照上的人像，当然是可信的，但下台阶时照片上的人数，是否就是抬棺人的全数，却也还有疑问。因为照片只是下台阶这一片刻的留影，而抬棺上车则是一个过程，在这

一过程中,人员是可以流动的。这可以从孔海珠女士所引的巴金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。巴金在《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》中说:“到了墓地,举行了仪式以后,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。那个刚刚在纪念堂上读哀词的朋友,突然从人丛中跑来,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,这情形把我深深地感动了……在往墓穴去的途中,灵柩是愈来愈重了。那个押柩车来的西洋人跑来感动地用英语问道:‘我可以帮忙吗?’我点了点头。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。”这里提供了两个信息:一是抬棺的人数是动态的;二是十六人同时抬棺是可能的——这里所说的十三四人,加上后来加进来的二人,不正是十五六人吗?因此,我还是采用萧军所提供的名单,因为他毕竟是出殡队伍的总指挥,而且文章的写作日期也离出殡的时间最近。

但这名单有十六人之多,我不可能一一都写,而且,就他们与鲁迅身后的文艺思想斗争的关系而言,也不必一一都写。比如,鹿地亘是日本作家,虽然支持过中国的抗日战争,但毕竟是客卿,与中国文坛没有深层关系;黎烈文在编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时,与鲁迅关系密切,还参加过《译文》杂志的创刊和编辑工作,并主编过《中流》杂志,但在抗战期间,僻处福建山城,远离文艺活动的中心,抗战胜利后就到台湾去了,更脱离了大陆的文艺运动;曹白主要是木刻家,吴朗西则是出版家,他们与文艺运动终究还隔了一层;有些作家死得早,有些作家则与鲁迅接触并不多。所以我只选与鲁迅接触较多,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事业,并深度地卷入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五位抬棺人:萧军、胡风、巴金、黄源和聂绀弩,再加上因做秘密工作的关系,未能公开出面抬棺,却是鲁迅丧事的幕后总策划的冯雪峰,共六人。他们的遭遇,也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看。

《鲁迅后传》可以有不同的写法。人们首先想到的,大概是围



各界群众自发为鲁迅送行，人群拥塞在胶州路上

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，截然不同的评价。的确，这些材料收集起来，足可以写成一厚本，甚至几厚本书。但我想，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。在他看来，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。鲁迅生前，所受的攻击就很多，他的看法是：“文人的遭殃，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后，言行两亡，于是无聊之徒，谬托知己，是非蜂起，既以自炫，又以卖钱，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，这倒是值得悲哀的。”^①他的这种担心，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。对鲁迅伤害最大的，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，而是打着他的旗号，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。这时候，他已无知无觉，无法抗辩了。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，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，而经受着苦难的

^① 《且介亭杂文·忆韦素园君》。本书所引鲁迅文字，只注篇名和集名，不注全集卷数和页码。因《鲁迅全集》有多种版本，而各图书馆所藏不一，反而不易查找也。



殡仪队伍出发前，萧军（前立背影者）在调度

历程。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《鲁迅后传》的写作材料，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。

据周海婴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中记载，1957年反右运动中，罗稷南在毛泽东所召集的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提问：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，他可能会怎样？毛泽东沉思了片刻，回答道：以我的估计，（鲁迅）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，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。——鲁迅已死，当然不能再关进监狱，但这句话却应验在鲁迅文学事业继承人的身上：萧军因为桀骜不驯，最早受到批判，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“决定”，把他的问题定性为“反苏、反共、反人民”；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道路，在1955年被打成“反革命小集团”的头目，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；到得1957年，冯雪峰、聂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，周扬在文艺



前来吊唁的小学生

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》中，将冯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，而聂绀弩在“文化革命”中又以反林彪、江青罪被打成反革命，判为无期徒刑；巴金在“文革”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，但也一直挨批，而“文革”风暴一起，就被作为“黑老 K”而受到批斗。

他们的悲惨遭遇，实在并非偶然。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，反对“帮忙文学”和“帮闲文学”；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，反对“瞒和骗”的文艺；而且，他早就看到了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”，却决不屈从于政治。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，继承他的文学事业，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？

目录

前言	1
萧军：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	1
胡风：九死而未悔的艺术殉道者	103
雪峰：头颅撞在理想的碑石上	248
绀弩：不自由的大自由主义者	381
黄源：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	457
巴金：重新举起了“讲真话”的旗帜	518
附录：鲁迅与“遵命文学”	586
后记	591

萧 军：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

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东北陷入了日本军队之手，许多青年学生、知识分子、工人和市民纷纷流亡到关内，北平、上海都出现了一批流亡作家群。萧军，就是这些流亡作家中的一个。

萧军本名刘鸿霖，原来是个武人，他当过骑兵、宪兵，又进讲武学堂学习炮兵，但因性格耿直，富有正义感，看不惯旧军营里乌七八糟的事情，好打抱不平，有时还要撰文在报纸上加以揭露，得罪了上司，终于在毕业之前被开除出来。他曾经联络一些具有民族



1928年萧军于东北讲武学堂

思想的军官，想组织一支抗日义勇军，但却遭到亲日派军人的威逼，被赶出部队，终于流落到哈尔滨，穷愁潦倒，靠卖文来勉强维持生计。因投稿关系，认识了《国际协报》副刊部主任裴馨园，就协助他编辑儿童特刊，同时继续写作。这样，他就弃武从文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。

职业虽然有所更换，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秉性却并没有改变。救助萧红的事，就是这时发生的。

萧红原名张迺莹，她为了躲避家长的包办婚姻，逃到北平，却被他的未婚夫汪殿甲找到，终于同居了。后来回到哈尔滨，长期住在道外东兴顺旅馆里，拖欠了六百多元的债务。汪殿甲说回家要钱，把怀有身孕的萧红抵押在旅馆里，从此一去不回。店家如果收不回这笔钱，就准备将萧红卖到妓院里去抵账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萧红给《国际协报》副刊《国际公园》主编裴馨园写了一封救助信。裴馨园派萧军到旅馆去给萧红送书，并了解情况，萧军在一间作过储藏室的霉气很重的房子里看到了萧红，只见“她全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，‘开气’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，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，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；使我惊讶的是，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，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，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。”^①萧红请萧军坐下来谈谈。萧军了解到萧红的困境，同时于无意中看到了她散落在床上的一些纸片，上面有她画的图案式的花纹、双钩的魏碑《郑文公》和自作的短诗。这首短诗，萧军直到晚年还记着：

① 《人与人之间——萧军回忆录》，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年版，第 212 页。

这边树叶绿了，
那边清溪唱着：
——姑娘啊！
春天到了。……
去年在北平，
正是吃青杏的时候；
今年我的命运，
比青杏还酸！

经过闲谈，看过她的作品之后，萧军的观感完全变了。他说：“这时候，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，季节在变了，人在变了，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……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！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！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，全消泯了……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、美丽的、可爱的、闪光的灵魂！……”他马上暗自决定并向自己宣誓：“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——拯救她！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！这是我的义务……”^①

萧军以报社记者的名义，警告旅馆老板，不许虐待萧红。当时，报社记者还有点社会威望，店家轻易不敢得罪，但若还不上钱，要他放人则是不可能的。然而萧军本人是一个穷文人，周围也都是些穷朋友，他到哪里去筹措这六百多元钱来还债赎人呢？倒是天赐良机，这年8月，哈尔滨连日大雨，松花江决堤，东来顺旅馆淹在大水之中，老板和房客都纷纷逃离，萧军趁此时机，雇了一只小船，到旅馆里去救萧红。但萧军去接时，萧红自己已搭乘一只路过

① 《人与人——萧军回忆录》，第213页。



萧军终于救出了有身孕的萧红

的小船逃了出来，他们是在裴馨园家会面的。不久，萧红产下一女，由于没有钱来付医药费，只得将女儿留在医院里，自己跑了出来，与萧军一起开始文学的跋涉。

那是在1932年秋天，东北全境都已在日本军队统治之下。不过，在沦陷开始阶段，日本统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军事方面，对于文化领域，还来不及全面控制。所以像《国际协报》这样的商办报纸，还有存在的空间，爱国的青年作家也还能进行文学活动。萧军和萧红都发表了不少文章，他们二人还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散文合集：《跋涉》，经费是由舒群等几个朋友凑起来的，书是由《五日画报》印刷厂秘密印刷的。但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统制的加强，许多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文化人都遭到了迫害，不时有人被捕、被杀，《跋涉》也被没收了。有一位朋友告诉萧军，在他被检查时，从他身上搜去了一张纸条，上面有萧军的名字和地址，所以叫他们赶快逃走。看来，哈尔滨是留不得了，萧军和萧红在友人一再催促

下，终于走上了流亡之路。

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青岛。因为萧军的好友舒群已经流亡到青岛，在那里找到了工作，并且成了家，可以帮助二萧落脚。

1934年6月11日，萧军和萧红经过化装，悄悄地离开了哈尔滨。他们先乘火车到大连，再换乘一艘大连丸轮船到青岛。在大连丸上，他们受到严格的检查，被盘问了一个多钟头。若稍露破绽，就会大祸临头。幸好萧军沉着应对，把自己的工作部门和去青岛的理由都编造得很像那么回事，这才蒙混过去。当他们听得钢链绞咬着的声音发出了，知道是在起锚，这才把心放了下来。后来，萧军写了一篇散文《大连丸上》，记叙此次艰险的经历，并抒写在船上看到青岛山角时的心情道：

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，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。

“啊！祖国！”

我们梦一般的这样叫了！

但是，萧军高兴得太早了。正如鲁迅在《三月的租界》里所说：“他们的回‘祖国’，如果是做随员，当然没有人会说话，如果是剿匪，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，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《八月的乡村》。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。那么，且慢‘从冻结里蠕活过来’罢。”

这个“祖国”，迎接他们的，不是温暖的怀抱，而是荆天棘地。

不过这一点，萧军自己也很快就认识到了。他在到达青岛之后不多久，写了一首诗，表达了他对祖国社会状况的认识：